

## 《愛記》中的 蔣中正：人際與 感情

許秀孟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

《愛記》主要是摘錄日記中對家人、師友、同志關愛之情與人際關係的描述。有別於其他四記，《愛記》的特色是更突出蔣中正內心情感波動的過程，這可分別從書中所呈現的兩大脈絡，一是人際網絡的建立；二是感情生活的鋪展兩部分來看。

關於這兩大主題，在美國胡佛研究所於2006年逐步開放《蔣介石日記》時，學界已經關注到這樣的課題，並有些研究成果。舉例來說，2009年由政治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工作坊「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學術研討會」，會中討論了蔣中正的各種人際交往，從親族、軍事人脈、地緣關係到用人、選才，以及蔣中正的愛情等，都使用了日記，並參照相關檔案資料書寫而出，後集結成《蔣介石的親情、愛情與友情》一書。學者楊天石在他的第二部《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——蔣介石日記解讀（二）》中同樣也專文討論了蔣中正的戀愛與婚姻；（註1）而再更早些時，學者陳進金也曾以《愛記》來看蔣中正與宋美齡的情愛。（註2）

有了上述的研究成果，對《蔣介石日記》的內容，以及一些關鍵史實，大致可勾畫一個清楚的圖像。例如喧囂一時的蔣、宋政治聯姻說法，從日記的比對證實下，已可破除這樣的刻板印象。如此，尚可從《愛記》看到什麼呢？《愛記》在經過編纂人員王宇高、王宇正的潤飾刪修後，文字或與日記已有所出入。但從經過編排的日記類抄中，可讀出《愛記》有意塑造蔣中正較為正

面的形象，如出現在日記上對人物的謾罵指責，以及其早年紛亂的感情關係，這些在《愛記》中都已不復見。雖是如此，但《愛記》仍忠於日記原意，其呈現方式能讓讀者對蔣氏的人際網絡與感情世界的發展主軸，有較清晰的理解。

## 一、關於人際網絡的建立

在《愛記》中出現了八百多位人物，在經過時間的推進，可以看到蔣人際網絡的形成是在繼承孫中山的人脈，加上自己的延伸開拓。學者呂芳上指出早期蔣的權位未穩，需要大老們加持，因此對革命元老及前輩，如吳稚暉、張靜江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多方遵從；與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，如汪精衛、胡漢民、廖仲愷、葉楚傖、戴季陶、閻錫山、馮玉祥，他則以謙卑自居。（註3）而這些軍政要人，多為孫中山時代的遺緒，蔣中正致力於承繼孫之人脈，有些人因權力角逐而漸形疏遠，有些則成為其摯友。到北伐時，蔣掌有一定的軍事實權後，開始注意蒐羅人才。1926年9月，蔣將考察人才列為每日功課；到1932年，則有系統的接見社會中各式各樣的人物，特別是知識分子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蔣在人物交往的累積中，擴大了其治國視野，從早期偏重軍事人才，逐漸擴展及全國事物的管理人才，在《愛記》中有這樣一條清晰的發展脈絡。

在繼承孫中山的人脈裡，特別的是蔣經

常對革命先烈追思緬懷與警惕。在特定的忌日裡，蔣在日記上都會記上一筆「自勉」，其中陳其美與朱執信的角色，在《愛記》中彷彿幽靈般不斷再現其身影。如1924年3月，蔣中正上書孫中山，追述其與陳英士不渝之革命情感，曰：「中正與英士，共事十載，始終如一，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。…以我兩人，萬古交情，雖手足之親，未足問其盟契，骨肉之摯，不能踰其恩義，肝膽相照，可質天日，故能與仗安危耳。」（本書頁7-8）此時距陳其美過世已八年之後，蔣仍細數其與陳之情感；接續的北伐、中原大戰、對日抗戰，每遇陳的忌日，蔣總在日記上抒發其懷思，或謂某次戰役的成功，將殊榮歸功於英靈庇佑；或謂因陳之過世，而感到共事乏人；或謂其忍辱負重，皆為告慰亡靈等等情感的抒發。同樣的情況，也表現在蔣對朱執信的緬懷。較為不同的是，蔣每以朱執信之「英靈」，攻訐政壇之大敵，汪精衛、胡漢民等。如1930年9月，時值中原大戰，對於汪兆銘與馮玉祥的互通聲氣，使其更思念朱執信，感嘆道：「回憶十二年前，執信死時，展堂、精衛皆痛哭甚哀，此為黨也，亦為朋友之情也。當是時，精神團結，何等親愛！至今汪竟自走絕路，可嘆！如執信尚在，汪決不致如此卑汙乎？執信實不可死也，嗚呼！」（本書頁73-74）

法國學者白吉爾（Marie-Claire Bergere）曾指出孫中山身後的紀念活動，對繼承者至關重要。（註4）蔣中正藉由日記抒發懷思，

提醒自己背負先烈英靈的「革命」道路，可以推知在公領域上有形的紀念儀式雖有其政治目的，但在日記中所顯現的情感認同，則直探了蔣內心幽微之處，對於理解蔣中正人格意志的形塑資源，甚有助益。

與政壇對手的交往互動，也占了《愛記》相當大的篇幅，可稱之為「不穩定的人際」。這些人物包含了汪兆銘、胡漢民、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李濟深等。由於與該些人物有權力上的競逐關係，蔣在此上的情緒波動至為明顯。以馮玉祥來說，北伐初成時，馮仍握有軍事實力，蔣對之態度謙卑，語多溢美之詞；然遇有利益衝突時，日記上隨之嚴厲相責。這樣「不穩定的人際」，可說是蔣情感最糾葛的部分。若能統整長期以來這些對人物快速變動的看法，或能理出影響決策大政背後所涉及的私人情感好惡，為歷史解釋多增添一些人性的詮釋空間。

相對「不穩定的人際」，蔣也有「真誠」的友人，舉陳景韓為例。陳景韓曾經擔任《時報》、《申報》總主筆，為蔣的民間友人。蔣每遇時局危困，不知如何措置之時，往往詢及陳景韓，並在與之對話中，獲取其所樂見的想法，記錄在日記上。如1930年初期，蔣時常面對地方軍人的武力威嚇，陳景韓告其「反叛部隊，不必先取攻勢，以待其叛逆昭著，而後討伐之為宜。」蔣聞之甚喜，隔日，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籌畫，即「取消一切通緝令，惟以武力或妨礙中央政

策者，當逮捕不赦耳。」（本書頁66）顯然，陳景韓的話在蔣心中起了作用。若進一步追索的話，蔣對陳景韓的信任與仰賴，可能來自於其長期關注陳在《申報》上的「時評」，則蔣氏與報人的交往，應與其閱報經驗相關，同時也可能影響蔣對大眾傳播媒體的認知與管理規範的思考。

## 二、關於感情生活的鋪展

若從史料的完整度來看，《愛記》在感情方面的陳述有些缺點。《愛記》刪除了日記中除了宋美齡以外，與蔣氏有婚姻或戀愛關係的女性，元配夫人毛福梅出現的場景，都要到了1939年12月蔣中正接獲蔣經國通知「其母被炸而死」，蔣方有「痛哉」之情感表露。（本書頁197）則《愛記》欲隱其早年紛亂感情關係的意圖，昭然若揭。相對的，《愛記》刻意營造蔣、宋完美的情愛，這裡茲引述一段：

19日，戰局稍定，病發熱假寐，念夫人，記其近事，曰：「子文不肯籌發軍費，內子苦求之，仍不允，乃指子文言曰：如爾果不肯發，則先將我房產積蓄，盡交爾變賣，以充軍費；若軍費無著，戰事必敗，吾深知介石，必殉難前方，決不肯愧立人世，負其素志，如此，則我如不盡節同死，有何氣節！子文聞之心動，使允即日勉力發款。」（1930.07.19，本書頁71）

此段為蔣事後的回憶，描述宋氏為其爭取軍費，不惜變賣家產的往事，寫來歷歷如繪，真摯感人，充分顯露蔣對宋的感念之情。

此外，對家人、族人的情感描述，《愛記》也摘錄不少，特別是對其二子的心情轉折。蔣中正對蔣經國從疏離到親近，對蔣緯國，則疼愛有加。引述蔣在 1938 年 12 月，回憶其在西安事變發生後，寫下給宋美齡的遺囑中，提及對兩子的看法：「經兒遠離十年，其近日性情如何？兄固不得而知；惟緯兒至孝知義，其必能克盡孝道……」（本書頁 179）蔣經國長期在俄國生活，不在蔣的身邊，且因中蘇關係的緊張，蔣對經國的態度不免猜忌。1936 年 2 月 14 日，日記記有蔣的猜疑：「本日得見經兒在莫斯科報上，致其母函，詞多詆毀余者，疑信參半，但念經兒無恙，中心為之一慰。」（本書頁 139）雖然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情，但聽到蔣經國平安無恙，蔣仍感到寬慰。後得到鄧文儀轉譯的蔣經國家書，蔣才知道「吾兒猶未忘本也」。（本書頁 141）更在獲得經國回國消息後，感嘆「十年苦鬥，方得國與家漸見光明也。」（本書頁 154）1937 年蔣經國回國後，自此隨伴在蔣身邊，父子情感漸趨深厚，這為蔣經國日後成為接班人打下了信任的基礎。

總體而言，《愛記》讓人強烈感受到蔣中正個人情感的波動歷程，其真摯流露的面向，確實跳脫對國家領導人表層的理解，

「民族救星」、「時代舵手」的標籤，在深入探索蔣氏的內心世界時，都已不適用。然除了人性考量外，仍得回歸歷史研究的基礎，即是文本、史料的解析。學者楊天石認為，蔣中正寫日記，是沒有準備要公開的，但其命人編寫《五記》，為身後立傳的用意頗深。（註 5）因此閱讀《愛記》中的蔣中正，自然不是它的全貌。《愛記》若要作為一個文本，對之研究或引用的話，除了需要參照其他四記之外，也需要再進行與日記的比對功夫。但《愛記》仍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，除了是揭櫫日記內容外，透過秘書的潤飾刪修，以及蔣的審閱後，可以探測在保留坦見與抹淨匿跡的選擇過程中，蔣所欲呈現給世人評判的是什麼，不欲人知的又是什麼，則此又為另一延伸課題了。

#### 【註釋】

1. 楊天石，《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——蔣介石日記解讀（二）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0），頁 502-526。
2. 陳進金，〈從「愛記」看蔣、宋情愛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第 11 期（2003 年 12 月），頁 275-288。
3. 呂芳上主編，《蔣介石的親情、愛情與友情》（臺北：時報出版，2011），頁 12。
4. 白吉爾（Marie-Claire Bergere）著，溫治益譯，《孫逸仙》（臺北：時報出版，2010），頁 8。
5. 楊天石，《找尋真實的蔣介石——蔣介石日記解讀（二）》，頁 xx。